

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赝本八种概述

杜伟生

本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，引起各国考古界的注意。之后，大部分敦煌遗书流失到英、法、俄等国。其余部分在解送京师途中，又散失了一些。为搜集这些珍贵的唐代遗物，许多机构和个人想方设法、不惜重金购求。一些人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，制作赝本欺世谋利。有些机构收藏的敦煌遗书中，不同程度掺杂着一些赝本。北京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，就有这种情况。在一万六千件敦煌遗书中，赝本的数量虽然不多，却直接影响对敦煌遗书的研究，因此，必须把它们一一甄别出来，这是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。

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（《敦煌劫余录》部分）中已辨明的赝本以下几种：

1：成 八二 佛名经 1 纸

此卷纸张严重老化，呈一根直径约 1 厘米左右纸棍状，现已不可展阅。

2：宙 三七 维摩诘经 1 纸

纸高 27.2 厘米，长 44.5 厘米。28 行，行 17 字。修复前，此卷呈一根直径约 1.5 厘米左右纸棍状，不可展阅。

3：成 三七 金刚经 1 纸

纸高 28.2 厘米，长 80 厘米。43 行，行 17 字。

4：昆 五三 金刚经 2 纸

纸高 27 厘米，长近 200 厘米。第一纸长 110 厘米，67 行，行 17~18 字。

5: 云 三五 妙法莲花经 2 纸

纸高 27.2 厘米，第一纸长 78 厘米，40 行。第二纸长 119 厘米，68 行。行 17~19 字。

6: 昆 九十 妙法莲花经 1 纸。

此纸现严重老化，成碎片状，不可展阅。

7: 丽 二四 金刚经 1 纸。

以上七种贋本纸色现在已呈黑褐色，均系通卷作伪。此外，还有一件部分作伪：

8: 冈 七四 金刚经 原为 5 纸。黄色。每纸高 25 厘米，长 50.5~50.7 厘米。现为 6 纸，原第二纸后半张、第三纸前半张已失，以一张 50 厘米长、纸色已呈黑褐色的纸补配其间。其纸 28 行，行 17~19 字。“须菩提”起，“不可思议”止。

以上八件，严格说是七件半敦煌遗书贋本，它们的特征基本相同，与敦煌遗书真本相较，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同：

1. 在纸张方面：

纸张纤维不同。敦煌遗书用纸均为韧皮纤维纸，纸面纤维柔软、纤细、光洁。贋本使用的是云杉类针叶木纤维纸。纸面纤维粗硬、光洁度差。

纸张制造工艺不同。敦煌遗书用的是传统手工纸，贋本用的是机制纸。

纸张染色用的颜料不同。敦煌遗书染色用的是植物性染料黄檗，贋本使用的大概是植物性染料、矿物性染料混合在一起的染料。使用黄檗的敦煌遗书虽历经千年，其色不改。贋本由于在染色前在纸上施用了明矾类物质，加快了纸张纤维老化速度。仅几十年时间，纸张已呈黑褐色，稍触既碎。不仅如此，“冈 七四 金刚经”中贋本纸上残留的腐蚀性物质，还污染了左右两边的纸，致使遗书原件与贋本连接外附近，也染上了一些黑褐色。

纸张厚度不同。以“冈七四金刚经”为例，敦煌遗书用纸厚0.1毫米，赆本纸厚0.09毫米。

纸张长度不同。敦煌遗书用纸高度虽有差别，但长度基本固定，一般在500毫米左右，这是由当时的造纸工艺决定的。赆本使用的是机制纸，长度较长。“云三五妙法莲花经”第一纸就长780毫米，第二纸竟达1190毫米；“昆五三金刚经”第一纸也长达1100毫米，约是遗书用纸长度的两倍。

2. 浆糊痕迹不同：在敦煌遗书中纸张接缝处，正反两面一般都可可见宽度不一的浆糊痕迹，糊痕呈红棕色，表面不平。赆本纸张接缝处，糊痕很薄，有的还有擦抹痕迹，表面较平，色淡。

3. 界栏的划法不同：敦煌遗书的界栏一般都是用墨划的，赆本的界栏一般是用铅笔划的。这两种界栏有时不易区分，但在较高倍数放大镜下，差别就很明显：墨划的界栏，墨汁中的色素在水的作用下，渗透到纤维内部，并被吸收；纸张表面虽因纤维互相交织而显得凸凹不平，但墨痕深浅，浓淡基本一致；由于墨汁与纸张纤维结合紧密，因而耐磨性强，用橡皮是擦不掉的。赆本的界栏是由铅笔在纸上滑动，是笔芯中的石墨在一定压力下粘附在纸张纤维上的，因而在纸张纤维表面上，表层纤维附着的色素就多，深层纤维附着的色素少。由于粘附方式较渗透吸收方式耐磨性差，所以，铅笔划的界栏可用橡皮擦掉。

4. 墨迹不同。敦煌遗书上的墨迹与纸张结合紧密，已完全被纤维吸收，“吃”在纸里，墨迹表面较粗糙。赆本上的墨迹与纸张结合不太紧密，没有完全被纤维吸收，墨迹“浮”在纸面上，表面较光滑。

5. 书法风格不同。敦煌遗书上的字，通篇看去很是美观。即使书法水平不高，书写风格也是一致的。赆本上的字有些写得好，有些写得差。通篇看去，书法风格不统一。

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？我们知道，敦煌遗书的制作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。北京图书馆藏“敦煌遗书 新 637 妙法莲花经”

尾有题记一则：

“上元三年十月十日，群书手王举写，用纸二十一张。装潢手谢善集。初校群书手赵彦伯，再校群书手赵彦伯，三校群书手赵彦伯。详阅太原寺大得神符，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，详阅太原寺主慧立，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。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、使朝散大夫守尚舍、奉御阎玄道监。”“新 690 金刚经”尾有题记一则：“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，书手刘弘硅写，用纸十二张。装潢手谢善集。初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，再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，三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。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，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，详阅太原寺主慧立，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。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、使朝散大夫守尚舍、奉御阎玄道监。”

两则题记中都有用纸记录，一件“用纸二十一张”，一件“用纸十二张”，但都没有纸张规格的记录。在其他的题记中，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。这是否可以说明在当时写经纸的规格基本差不多，没有很长很宽的纸，所以不用特别说明。再有，手工制造的写经纸当时比较贵重，管理制度还比较严格，用了多少都要登记清楚。

从这两则题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：一件敦煌写经的完成，有这样几道工序：书写；装潢；再经三遍校对，四遍详阅才完成。

这些工作都由专业人员完成。书手、群书手，就是职业写经人。从敦煌写经中很少有丢字及错字的情况来看，这些人对佛经非常熟悉，字写得非常熟练、流利。经过长期抄写佛经的训练，每个书手都有了自己的书法风格，书写起来随心所欲。装潢手，是将写经纸粘接在一起，并在结尾部分加装木轴、开头部分加装“迎首”及“天杆”的工匠。这是以装裱为职业的人。从敦煌遗书边栏的情况来看，当时装裱工作规模是很可观的。“重九八金刚经”自第二叶起，下面一条边栏长达 270 厘米。在 265 厘米处，栏线弯曲，可知当时划线尺的长度是 265 厘米，与现在装裱行业中使用的最长的尺板长度相等。以此推算，裱案长度当在 270 厘米以上。

写经纸有先划好界栏后接在一起的，也有先接好纸再划界栏的。从“重九八金刚经”边栏的情况推断，划栏的工作也是装潢手完成的。划栏的时候，以笔者的经验，仅有尺、毛笔、墨还不能划线，因为蘸了墨的毛笔笔头是软的，不能直接靠在尺边划线。这就要用专用工具“笔床”来协助。笔床是用一条长15厘米、宽1.2厘米厚1厘米左右的木条制成的，木条一侧挖有圆槽，两端削成“U”型，用以固定毛笔。若想把界栏划得粗些，笔尖就伸出木条U型脚多些，若笔尖伸出木条“U”型脚很少或基本平形于木条“U”型脚，就能将界栏线划得很细。书写、装潢之后就是校对，而且要校三遍。最后，还要由专门研究佛学的僧人“详阅”，整个制作过程都有人监督。

赝本的制作则不然。首先，选择纸张不太容易。敦煌遗书被发现时，距离唐代已上千年。造纸技术虽未有大的改变，但工艺、设备及规模已非唐代可比。造纸机械的出现，也使造纸原料从用麻、树皮等几种韧皮纤维迅速扩展到竹、木等的茎秆纤维许多种。因此，在品类众多的纸张中寻找一种与写经纸相同的纸绝非易事。赝本的制造者只能选用颜色、薄厚差不多的纸来代替，选用的标准是像不像写经纸。至于这纸是用何种纤维制造的，一般人是不注意的。

其次，制作的人数有限。制造赝本的目的是为了牟取高额利润。参与赝本制造的人一般很少，多是一个人承担书写、装潢、校对等全部工作。赝本制造者不太可能既是书法家，又掌握装裱技术，还通晓佛学。因此，不管造假者的手段多么高明，赝本上都会留下一些破绽。真伪掺半的“冈七四金刚经”中，赝本部分特征就很明显。由于经文是临摹的，书写者不能随心所欲的书写。所以有些字形书写者较熟悉，书写时就比较流畅；有些字形较生疏，书写时就滞涩，造成书法风格不统一。再有，每个时代书法特点不一样，字的写法也不尽相同。例如“男”字的下半部分，在原件经文中写成“分”形，在赝本中就写为“力”，等等。而且赝本

中第21行“然佛前”下右侧有一“灯”字，显然经文应为“然灯佛前”。经文中出现漏字，大概是赝本制造者不熟悉佛经的原故。至于用铅笔划界栏，纸张接缝浆糊使用不规范，其原因也很简单：不是缺少必要的工具和设备，就是赝本制作者对装潢或者说对装裱技术知之不多。

关于赝本的制作年代。《敦煌劫余录》中“成八二佛名经”下附注：“字迹奇丽”；“昆九十妙法莲花经”下附注：“字体尚存八分意味”；“宙三七维摩诘经”下附注：“纸色淡黄带灰，质地颇类近时洋纸”。虽没有明确著录为赝本，但其用意不言自明。《敦煌劫余录》出版于1930年，而敦煌遗书入藏前北平图书馆的时间是1919年。赝本的制作时间，在1930年以后似太晚，1919年以前又不太可能，当在1919—1930年之间。从纸张的纤维、颜色、墨迹、界栏等情况综合分析，这几种赝本当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制作的，也许还是同一造假者所为。

赝本的鉴别是敦煌遗书整理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。鉴别赝本需要多种学科知识，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做，这才可能做好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